

“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

——论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

杨爱芹

【提要】沈从文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是他编辑时间最长的一个副刊，也是他编辑的最后一个副刊，不仅融汇了他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同时也更进一步寄托了他对文学复兴的种种希望，寄托了他重造国家、重造文学、重造青年的理想。把沈从文在《益世报·文学周刊》的言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更为客观地理解沈从文的文学观念，更加准确地理解沈从文的思想指向，同时也能从沈从文的编刊构想中获得一些启示。

【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周刊》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1-0083-06

一个副刊能寄托编者什么样的希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沈从文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或许能得些启示。《益世报》1915年创办于天津，至1949年在大陆停刊，“是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①与《大公报》一样，《益世报》一直持守着自由主义立场，吸引的多是坚持思想自由的作家。1946年10月16日沈从文接编《益世报·文学周刊》，至1948年11月8日停刊，共出版118期，占用《益世报》第三版，每周日出刊。这是沈从文编辑时间最长的一个副刊，也是他编辑的最后一个副刊，不仅融汇了他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同时也更进一步寄托了他对文学的种种希望。

沈从文是个作家，但编辑《文学周刊》的这一时期，他更像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过程与现实紧紧纠缠，这个小小的副刊，处处显示着他思索的内容与思索的痛苦。在沈从文的编者言、散文、题记、评论以及与青年作者和读

者的通信中，“重造”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用于“重造国家”、“重造社会”、“重造政治”、“重造青年”、“重造文学”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周刊》宏观规划的蓝图。把沈从文在副刊的言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更为客观地理解沈从文的文学观，更加准确地理解沈从文的思想指向。

一、重造国家

沈从文一向反对文学被政治、商业左右，但他有着强烈的社会功利思想，即希望利用文学重造国家、重造社会，认为文学“可以修正这个制度的错误，纠正这个民族若干人的生活观念的错误”。^②抗战胜利以后，沈从文认为文学所应担当的重任就是重造人的品德，消解内战威胁，使国家和平复兴。

接手《文学周刊》的第一天，沈从文便发

① 《益世报》影印说明，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沈从文：《元旦日致》，《大公报·文艺》1934年1月1日。

表了《文学周刊开张》一文。一个关于文学的副刊要开张了的编者言，却由空袭写起，“八年的空袭教育，使我深深明白这件事对于人民的恐怖和残忍”，终于盼着抗战结束了，“太和殿上签字的桌椅，和其他历史文物一样，还陈列在那里供人欣赏，怎么北平还有空袭？难道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当真还有这种驾驶员，有炸本国土地人民的兴致？”；但他最担心的是“有些事看来不可能的也可能于中国发生”。因此他在第一期的《文学周刊》上，“特选两篇有关空袭的故事，作个纪念，纪念八年中一切为国牺牲的年青战士和无辜平民”，以说明中国不要空袭和战争，甚至希望“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这两位奔走调停中国问题，于参考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文件之余，从我这个小文件上，试看一点公家报告不大提及的事情，即中国人民盼望和平的心”。^①一个副刊的第一次亮相往往是郑重而又审慎的，沈从文的文章和特意选编的作品说明了他的良苦用心，他让文学承担了避免战争的重任，因为国家的重造与复兴，需要和平。

紧接着在下一期，沈从文又意犹未尽地发表了一篇长文《编者言》，文章回顾了副刊发展的历程以及在历史发展、文学变革、国家重造中的作用，具体阐述了小小副刊是怎样支配了知识分子的兴味和信仰，怎样帮助新作家的抬头露面，怎样教育了一代年轻人，怎样奠定了新文学基础，怎样促进了北伐成功。他认为，在社会上充满纷乱、虚伪、敷衍之时，一个副刊“还容许人寄托些荒唐的希望，夸张的打算，而且能引起相当的作用”。副刊既有个光荣的过去，那么现在还应该继承这一传统，在这分解、崩溃、乱糟糟的现实社会中，“希望它能有作用，即在年轻一代观念情感中能消毒，能免疫，能思索，能独立，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即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②

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编辑副刊的理想追求，在编刊一周年的时候，沈从文发表了《本刊一年》，再次陈述了对副刊寄予的厚望，言辞间充

满了沉重，也充满了不灭的理想，“一年时间原极短促，但想象这一年来国家在悲剧中所进行的焚杀破坏，对国家元气的消耗，到了什么程度，社会在矛盾发展中，如何逐渐分解，并由于这种分解，使当前一代青年，如何由无可奈何的彷徨、苦闷转入绝望，下一代青年，还将因此增加多大担负，会觉得人民对于转机之来，实如何迫切希望，举凡能否定这个乱糟糟的现实，有粘合这个国家破碎具建设性的工作，都如何值得重视”。^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认为小小副刊所作的努力，总有些意义。

仅隔一周，沈从文又发表了《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内容是创刊时《编者言》的一部分，重新加了题目，这个新题目更明晰地显示出编者编辑这小小副刊的大决心。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玩弄政治的权利，但是他可以营造一个说话的空间，借助报纸这种大众传媒，广泛地影响民众，影响世道人心，话语的权力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内容的重复说明沈从文对其所阐述思想的重视，他让副刊承担起了“重造”的重任，甚至希望以副刊之力扭转乾坤。因为副刊在五四时的发展历史证明，它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

这一时期沈从文的文章充满了忧患，“为国家在对外战争结束后，还有人对内战发生浓厚兴趣，各有种种方法促成集团自杀的现象，置国家人民于水火，痛苦二字，似还不容易形容到这些年过四十读书人的本来心情”，^④他多次引用屈原《离骚》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泣，哀民生之多艰，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予之中情”，表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忧虑。更令他担忧的是，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又重新陷入一种人工催眠头脑呆钝趋势中，对战争、对

① 沈从文：《文学周刊开张》，《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13日。

② 沈从文：《编者言》，《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20日。

③ 沈从文：《本刊一年》，《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0月18日。

④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一〇一》，《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16日。

社会滋生的新式的堕落和腐烂且有趋之赴之的可能。在这一关键时期，沈从文希望文学能承担起影响人心、影响社会走向的重任。国家重造的根本在于人的重造，必须用文学改善人性，重塑民族精神，“影响当前局势倾向的，能否定武力所作成的现状，或平衡两种武力所作成的现状，扭转这普遍腐烂社会的，当然是文史底子的思想家”。^① 沈从文呼吁文学家们行动起来，沉思中国的问题，拯救国家、拯救社会，最终达到重造的目的。

编辑《文学周刊》时期，沈从文很少写小说，主要发表的是一些散文，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且不管这种想法有多大的可操作性，这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梦想，这是一个善良文人的希望。沈从文的这种国家重造思想与他在《益世报》新闻版发表的纪念《益世报》一万号的长篇论文《穷与愚》是一致的（1946年10月10日），物质的穷与精神的愚是中国的根本问题，破除“愚”，文人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沈从文主编《文学周刊》，就是想通过副刊造成一种舆论氛围，为建国复兴作些努力。他对文学启蒙、改造社会的责任抱以过高期望，赋予了文学无比沉重的历史使命，有时甚至把它夸大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他关于文学的认识饱含了对文学服务于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热切期待。

二、重造文学

八年抗战的沉潜，使沈从文对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有了更直接和深切的体验，他对文学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文学对建国复兴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使命，所以恢复民族自信、打造民族辉煌、重塑民族品格，首先要有一个文学运动的重造，由文学的复兴作为建国复兴的起点。

正是有着重造文学的宏大理想，沈从文写道：“至于来编个星期副刊，不是为热闹可想而知。但这个每星期八千字的刊物，编者对于它也的确保留了一点点希望。说来可笑，既无政治意义，又少经济价值，只是期望它能名副其

实，可望像个‘文学副刊’，文学副刊有个传统的素朴性，所以此后新式八股的理论批评，离奇不经的文坛消息……恐不易从刊物上见到。为的是副刊有副刊的意义”，^② 这个意义就是要像20世纪30年代主编《大公报》那样，打造纯文学阵地，像五四时期的副刊那样，再造一个文学的辉煌时期。

沈从文认为，能够掌握一个刊物的作家，在当前更应该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患的理想。一个优秀的报刊工作者，必须具有合理的素质结构，知识、经验和文笔三者缺一不可，只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优美的文笔，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报刊编辑。“同是知识、经验和文笔，在将三者综合表现上，得失就可见出极大差别”，^③ 这不仅有一个素质结构的问题，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信仰、生活兴趣和人生态度对之也都有一定的制约。所有的编者要建立起一种责任感，必须明白肩上的神圣使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能够尽些什么力，应当如何去尽力。

沈从文非常看重副刊在培养作家和发展文学方面所具有的功用。他认为，报纸副刊是培养作家的一方沃土，副刊虽然篇幅小，但是它刊出次数多，发行量大，读者面广，因而是作家崭露头角的重要舞台。在现代新闻事业诞生以后，很多作家都是由副刊培养出来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也都借助副刊与读者见面；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提高，副刊功不可没。因此，他希望《文学周刊》一面就过去副刊对于读者的信用，能好好保持，一面就新的需要、想法，将这个方式推广到其他报纸，共同搭建一个振兴文学的平台，文学的历史使命有望在这种努力中完成。

如何实现文学的重造，沈从文认为五四运

①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一〇一》，《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16日。

② 沈从文：《编者言》，《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20日。

③ 沈从文：《论特写》，《益世报·文学周刊》1948年1月31日。

动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典范，“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①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大转变的一个枢纽，它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品格，如建设性、独立精神、学术自由、知识分子的理性、怀疑否定的精神。正是拥有这种精神，造就了五四运动文学的辉煌，五四运动以后文学的衰落也是因为放弃了这种精神，文学与商业、与政治结合，表面很繁荣，但五四运动单纯虔诚的精神，在慢慢地萎缩，失去原有的意义。只有作品不当作商品与官场的点缀品，所谓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方有机会表现，而且作品中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的批评精神，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当真理解五四运动精神的人，“必承认对于强权所抱有的怀疑否定的精神，修正改进的愿望，在文坛上还得好好保留它，使用它。天真和勇敢尤其是不能缺少。五四已有了三十年的历史，我们还需要重来三十年继续努力”。^②

为扩大《文学周刊》的影响，沈从文写道：“如今除固定稿件外，实希望能够得到朋友的热忱帮忙与善意合作，或把四千字以内稿件寄来，信托编者自由处分，或成为长远读者，且把改善意见相示；编者在这两种鼓舞中，一面就过去副刊对于读者的信用，能好好保持，一面就新的需要，想法将这个方式推广到其他报纸，得出个相似的倾向，即报纸副刊，对作者将为一个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对读者将为一个具有情感教育的机构，作者与读者间能建立那么一个新的关系，编者说的‘副刊能像个副刊’，或者会为人首肯，北方的文学运动，也许会从沉默中慢慢展开”。^③ 在主编《益世报》的同时，沈从文还主编着《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和《大公报·星期文艺》，三个副刊的风格非常相近，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打造北方文学阵地的信心和努力。

沈从文以《文学周刊》作为文学重造的尝试，作为编者，他不但大量发表文章，提倡踏踏实实写作，使作者了解编者的爱好与趣味，还通过刊发作品给作者提供范例，引导和启发作者的发展方向。面对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复杂

局面，与某些自由主义作家躲进书斋致力于超然文学不同，沈从文张扬文学的独立性和本体性，但从不放弃作家的责任。不但不否认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且有强烈的以文学介入民族命运和重造文学的使命感。沈从文几乎是用整个刊物使文学成为一种尊严的事业，他在这个副刊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种信仰的建构，它寄托了沈从文的政治理想，也记录了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

三、重造青年

无论是国家重造还是文学的重造，沈从文都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人身上。他强调：“文学运动如当真还可阐扬些问题，对于纯知识重视，便应当是明日目标之一。恰恰如否定纵横政治，重造一清新明朗新的青年人生观，是文学运动另一目标”。^④ 沈从文在《文学周刊》的文章，经常提到青年，与“重造”一样出现频率高的就是“青年”一词，可以看出他是如此地热爱青年、器重青年、关心青年，寄厚望于青年。在他看来，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青年头脑呆顿、毫无生气是堪忧的，而如果青年们能保持自由思想、自由竞争的锐气，必会形成明日国家转变的基础，社会重造的希望才有可能实现。

每年的五四运动沈从文都会有感而发，因为五四是一场青年人的运动。在《文学周刊》上，1947年5月4日沈从文发表《五四》一文，1948年5月4日又写作了《纪念五四》。沈从文认为纪念五四、追忆过去，是为了解决现实矛盾，社会矛盾冲突越大，纠纷越多，国难越严重，现实越黑暗时，越需要纪念五四。“因为五四二字象征一种年轻人求国家重造的强烈愿望

①② 沈从文：《纪念五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8年5月4日。

③ 沈从文：《编者言》，《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20日。

④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一〇一》，《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16日。

和表达这愿望的坦白行为”。^①青年是最有活力最激进最有希望的群体，一切进步改革都有挫折、有迷乱、有错误、有牺牲，如何减少损失，青年们应该有个更新的想法，目前国家的内战是集团的自杀，只会给人民带来各种灾难、无辜的流血、普遍的穷困以及一切进步的好梦的破灭。拯救国家，“要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才会有个转机”。“这需要一种充满宗教虔诚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是待人从更新一种文学诗歌运动中来证实，而从年轻的新的对流中传染，得到应得收获的”。^②这就需要青年作家更健康更坚实，在国内各地普遍生长，一支笔贴近土地人民，写出有生气有理想的新时代颂歌。

沈从文特别注意扶植青年作者，他相信一个好的刊物和好的编辑几乎可以左右一个青年的文学之路。他曾经回忆自己初到北京四处投稿的艰难历程，“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③直到《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第一次把他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所以，沈从文办《文学周刊》非常注意提携年轻人，认为一个编辑，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

在谈到自己刊物的作者队伍时沈从文曾作了简单举例，“最年青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④常发作品的柯原，只有十八岁，所谓的老作家盛澄华也只是三十岁多一点，可见在《文学周刊》周围集结了一支多么年轻的作者队伍，有一半以上是北方新人的作品。

沈从文非常爱护年轻作家，1947年，柯原父亲病故，家中欠债，沈不但在《益世报》上倡导捐助，还卖字为之还债。他在《文学周刊》

发表的《新废邮存底》都是些给青年作者的回信，显然这种公开信的形式，不是针对个别文学爱好者，是针对所有文学青年的。他所阐述的文学观念，虽然缺乏系统性，但借助媒体，有广泛的影响作用。

沈从文反复强调年轻的作家们应该用手中的笔，看清楚历史与未来，挽救国家的堕落，有勇气承担民族的挫败，修正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青年人要不断学习，克服困难，确定一种新的人生观，对于人、对于事，永远用一个崭新的态度去实证，踏踏实实、持之以恒，把学习从第一步到终点，当成一个沉默艰苦的长途跋涉，把人生历史一起摊在眼前，用头脑加以检讨、分析、条理、排比、选择、组织、处分，明白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未来，重新说明、重新诠释、重新为这个民族的幸福而努力，选取一份相当沉重的责任到肩上、手上、灵魂上，将国家并世界带进一个崭新的真正进步和繁荣阶段。

在《本刊一年》中，沈从文谈到这个小小刊物所欲作所能做的挣扎，虽薄弱而无力，但却受到读者的重视、欢迎、关注，而感到无限欣慰，“国家问题既日益深刻严重化，因此这小小刊物，能存在一天，必将依然守住原来简单朴素态度，继续为作者为读者而工作”。^⑤作为编者，他的观点不是个人发言，而是渗透到刊物的编辑中，使副刊成为一个阵地，扩展了文学影响，凸现了作为一个群体所坚守的文学立场。

内战的爆发已经给作家摆出了新的课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变得格外突出，沈从文依然相信文学会在政治之外找到自己的出路，这条路是从战争以外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完成文学、国家、青年的重造。沈

^{①②} 沈从文：《五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5月4日。

^③ 沈从文：《记胡也频》，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版。

^④ 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三二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0月25日。

^⑤ 沈从文：《本刊一年》，《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0月18日。

从文对文学独立意义的追求与报纸的办报宗旨不谋而合，所以他可以在《文学周刊》上建构自己的文学蓝图，用他独特的文学观念影响着这个刊物和他周围的年轻作者与读者。沈从文的文学功利观，不是急功近利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在认识文学的社会改造作用方面，左翼文学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式，沈从文主张人生观再造的方式，以道德的、美学的力量实现文学的社会效用。在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编辑的《文学周刊》，清晰地体现了沈从文的希

望、焦虑与挣扎。在当代报纸中，文学副刊的版面缩水，文学的内容减少，一个报纸副刊可以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从沈从文编辑的《文学周刊》中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天津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The Hope Placed in a Supplement

—Discussion on *Yi Sh Bao, Literature Weekly* edited by Shen Congwen

Yang Aiqin

Abstract: *Yi Shi Bao, Literature Weekly* is a supplement chiefly edited by Shen Congwen for quite a long time. This supplement is also the last one edited by Shen Congwen, in which not only his abundant experiences as a newspaper editor converged, but also the hope for literature revival was placed—the ideal of reconstructing the country, the literature, and the youth. Considering Shen Congwen's free press as a whole, you can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conception of Shen Congwen more objectively, and his thought direction more precisely.

Key words: Shen Congwen; *Literature Weekly*

观点选萃

德日两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比较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郎芳

山东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2006级研究生郎芳在《德日两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比较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的内涵广泛，目前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概念。我国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等从技术范式、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循环经济一词的定义进行了阐述。总的来说循环经济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闭路循环，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种必然趋势，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发展循环经济起步较早、水平较高、发展意识较为强烈的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不仅需要政策和技术支持，还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保障。德日两国始终重视本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目前已经较为完备，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其成功经验积极发展循环经济。而我国的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在法律体系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赶超型工业化道路，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复杂性和艰巨性都是发达国家所未经历过的，我们更要清醒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德国和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马光 摘编)